

*Enlightenment,
Literature and
Dram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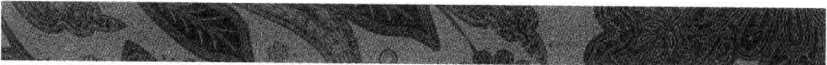
Dong Jian

中国新文学研究丛书

启蒙、文学与戏剧

董健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资助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英文标识简称 PAPD）
南京大学中国文学与东亚文明协同创新中心资助项目
南京大学 985 工程项目经费资助出版项目

*Enlightenment,
Literature and
Drama*

中国新文学研究丛书

启蒙、文学与戏剧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启蒙、文学与戏剧/董健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中国新文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02-010253-2

I. ①启… II. ①董… III. ①戏剧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当代—文集
IV. ①I207.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28804号

责任编辑 付晓霞

装帧设计 陶雷

责任印制 王易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52千字

开 本 890毫米×1290毫米 1/32

印 张 9.75 插页2

版 次 2014年10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253-2

定 价 34.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启蒙理性视角下的文化民族主义	1
民族主义文化情结:消解启蒙理性,阻挠人的现代化	8
略论启蒙及其与文学的关系	21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几个问题	40
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中的价值观问题	59
论“反修防修”文学	85
江苏短篇小说五十年	95
现代启蒙精神与中国话剧百年	106
现代启蒙精神与江苏话剧百年	127
戏剧现代化与文化民族主义	136
五四新文化传统与作为“现代民族戏剧”的中国话剧	143
论中国当代戏剧启蒙理性的消解与重建	
——1949—2000 年大陆戏剧文化特征之检讨	149
中国大陆当代戏剧启蒙精神之衰落	168
中国当代戏剧史稿·绪论	180
《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 年)·戏剧卷》导论	208
戏剧性简论	230
再论戏剧性	
——兼答张时民博士的质询	254

跪着献艺与站着演戏	
——序《赵耀民戏剧杂谈》·····	266
献给校庆的精神美餐	
——看南大校庆话剧《蒋公的面子》有感·····	273
对《大秦帝国》的质疑·····	280
“秦家店”核心价值在当今的反动性	
——对《大秦帝国》的再质疑·····	290
再谈《大秦帝国》的“反动性”·····	300
后记·····	309

启蒙理性视角下的文化民族主义

开 场 白

文化民族主义应该说是一个很陈旧的话题,至少已经谈论了一百多年了,而且也可以说,其中的是、非、曲、直,基本上已经清楚了——这在王国维、陈独秀、胡适、鲁迅、陈序经、张东荪以及近年读到的顾准、李慎之、钱钟书等人的著作中都是说得很明白的。他们都是以民族立场和世界眼光看待文化问题,因而对文化民族主义是持批判态度的。譬如王国维就说过:

……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于是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为一目的也。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然则吾国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则庶可有发达之日欤?(1905年《论近年之学术界》)

这里推崇的是“不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的真理之探求,尤其“当破中外之见”一语,更是打中了文化民族主义那种封闭、自恋、自卑而又自狂、自大却又恐外的文化心理,并且指出了这种倾向与知识分子的政治依附性的关系。事理至明,一百年后的今天也还是这个道理,似乎没有什么必要再饶舌了。然而我们今天却仍然不得不时面对文化民族主义的缠绕,因为它在我们的文化生活和学

术研究中还有着不小的影响,还在支撑着一些相当错误的理论和实践——这些“理论”和实践大多与反启蒙、反现代,非民主、非个性的思想倾向相联系。

一、一个错误的说法广为流传

一个多月前,在南京大学为匡亚明老校长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出版而举行的很隆重的座谈会上,一位主管我国教育和文化的高层官员在谈到中国传统文化时引用了一个颇为流行的说法:“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此一说法常见于文章和讲话中,据说来自鲁迅,似乎是无争之言、不刊之论。果真如此吗?

其实,这是一个文化民族主义的观点,鲁迅何曾出此言!仅从他20世纪初发表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重要论著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眼光来看,就可知他的观点是与文化民族主义完全相反的。此说大抵是来自对鲁迅1934年给陈烟桥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的误读和曲解。原话是:“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①请注意,“地方色彩”并不等于“民族性”;“为别国所注意”,也并不是获得了普世性与世界意义的意思。这里讲的只是文化传播中的求异好奇之心,却被歪曲成了艺术价值认同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问题了。只能说一切具有世界意义和普世价值的文化现象,其来有自,必然是带着民族特色的;但并非一切具有特殊的地方性、民族性的文化都可以成为世界的。即获得全人类共同、相通之价值的。如傅雅兰(J. Fryer)1895年所说之吸鸦片、做时文、缠足,均是中国文化中的东西,胡适亦论及这三样“反人”的文化现象,它们都很有民族特色,也很为别国所注意,能说它们会成为“世界的”吗?冯骥才的小说《三寸金莲》对缠足虽有所批判,但其主调是欣赏和歌颂,作

^① 《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9页。

品所流露的“审美情调”多有不健康之处。这正是中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种文化民族主义之毒的结果。此人曾攻击鲁迅关于改造“国民性”的观点是“来源于西方人的东方观”,指责鲁迅“没有看到西方人的国民性分析里所埋伏着的西方霸权的话语”。^①自然,只有在文化民族主义的“视野”里,冯骥才对鲁迅的不满才是有“道理”的。有些人很“爱国”,只要是“洋人”的批评就视之为敌意,喜欢外国人的赞扬。而鲁迅却指出:有的洋大人称赞中国文明,不过是“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②。

二、背离启蒙理性的“爱国”“救国” 之心与“民间”之情常使知识分子 陷入文化民族主义的泥淖

儒家有“问世”之心,这一传统使我国知识分子有很浓的政治情结,其“爱国”、“救国”之志甚强。但当他们的学术带上了政治依附性时(如上文所引王国维所指出的那样),真理的探求便杂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不能“破中外之见”,于是便陷入文化民族主义的泥淖,自我阻断了探求真理之路。即使当他们与官方政治发生矛盾而遁入“民间”之时,也往往倾向于民粹主义,而不能从民族主义的泥淖中脱身。

外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起自德国的浪漫派哲学家和批评家赫尔德(J. G. von Herder, 1744—1803)。当时的西方,英国和法国的发展均先进于德国,在德国的民族心理中,便生出一种不敢正视也不愿承认的自卑感。出于自尊,进而求精神上的“自我安慰”、“自我保护”,以赫尔德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便出而批判对英法的现代化事业贡献极大的启蒙理性,大讲本国日耳曼文化的“民族特性”“国民精神”,强调

① 《鲁迅风波》,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27—128页。

② 《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6页。

文化相对主义,反对文化的普世性。马克思曾批评这种民族主义是“头足倒置”——“只敢在头脑中完成邻国在政治上已经完成的变革。”这就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中国1958年“大跃进”运动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民族自大狂与“赶英超美”的急切心理,就有这样的“头足倒置”的特点。

政治当权者与文化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很容易形成“共谋”,两者在背离启蒙理性上是相通的——在“群域”反民主,在“己域”反自由与个性,否定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价值观。他们对外讲“特殊性”“个别性”,不承认人类文化的共同、相通的普世性价值;对内讲“共同性”“统一性”,不承认“人”的个性自由与人格独立。

胡适说过:“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①这段话经常遭到政治专制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共谋”的批判和攻击。其实这个观点完全出自启蒙理性,既是爱国的,又是有世界眼光的,充满了辩证法。

政治家由于“掌权”的急切之心,反而缺乏这种辩证的观点。孙中山说:“民权主义是为国家争自由……万万不可再用到个人身上去”,“国家要得到完全自由,便要大家牺牲自由”。^②蒋介石只是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立场赞同“五四”,但对五四运动的科学、民主精神则有保留,他认为应当补充上民族主义作为“第三个口号”^③。而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淡化“五四”的科学、民主精神,突出“爱国主义”,与蒋先生之见惊人地相通。1952年蒋在台湾再次倡导“读经”运动,他说:科学、民主“救不了中国”,“孔经是我国优秀民族文化的精华,是我们和共产主义者斗争的有力武器”。^④时隔半个世纪,“共产主义者”的大陆居然兴起了“读经热”!这难道还

① 《胡适文集》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1—512页。

②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二讲》。

③ 蒋介石:《教育与革命及国家重新建设的关系》。

④ 转引自[美]周策纵著《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484页。

不值得我们深长思之吗？

我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民族主义也是在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具有封闭性、排外性与政治上的依附性（或曰：“媚上”）。

关于“伟大的民族复兴”这个主流意识形态的口号，目前还存在着不少模糊之见，其中掺杂着一些文化民族主义的东西。“复兴”到哪里去？西方的“文艺复兴”以古希腊为准，我们以哪朝哪代的文化为标准？现在提倡建设“和谐社会”，这样的社会应有什么样的文化？“和谐”（harmony）与“单一”“一律”正相反，而是多样性、不同性相容、相济的结果。显然，封闭、保守、排他的文化民族主义对建设“和谐社会”的文化是极为不利的。

从1989年政治风波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在中国大陆曾发动过相当规模的“精神清理”和“思想整肃”，批判启蒙主义，批判以王元化为首的“新启蒙”，试图推翻经济、政治、文化上的改革开放路线。在这一形势下，文化民族主义情绪迅速上升，主要倾向是“排外媚上”。南京大学也有人参加了对王元化“新启蒙”的批判。邓小平南巡讲话才扭转了这一形势。

1999年科索沃危机与中国大使馆被炸，使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稍有收敛的民族主义情绪又大大的高涨起来，“排外媚上”的情结在知识分子身上越来越重。于是有些青年盲目对外来事物说“不！”有些人则相信了北京大学教授季羨林所说的“东方文化将去挽救衰颓的西方文化，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这样的充满文化民族主义情绪的话。

进入21世纪后，文化民族主义的热度直线上升。2004年被称为“文化民族主义年”。有几十位文人学者参加的“文化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发表了充满文化民族主义的《甲申文化宣言》。这个《宣言》叫人想起1935年王新命等十位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也叫人想起1958年牟宗三等人在台湾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他们都反对人类文化的共同价值，否

认文化有高、下之分，文、野之别，先进、落后之不同。

同时，“读经热”“祭孔热”吹起了一股复古之风。少儿读经的倡导者蒋庆教授颇为煽情地说：“难道两千年来西方的知识分子是走过来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则是爬过来的？”其实，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依附性与精神上的奴性，确实使他们“爬”过——站不起来。文化民族主义就是知识分子站不直的一种表现。

三、在“全球化”时代，文化要多元化， 而文化价值标准却是统一的

从上文所引王国维“当破中外之见”到邓小平的不要争“姓社”、“姓资”之论，其中贯穿着一个很正确的观点，那就是：真理的阳光普照全人类，它不分阶级、人种、国度、宗教。无论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还是西方的古希腊、文艺复兴、启蒙主义时期，先贤所已经达到的真理性，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之、发展之，不可能取代之。因此，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取代了启蒙主义”，从而否定启蒙理性的观点是荒谬的。

“全球化”时代，不论是一国的“和谐社会”，还是万国的“和谐世界”，都应该是“多样性”的统一，“不同性”的融合。尤其是文化，必定是非常多元的。这“多元”主要是指文化的表现手段（媒介）、形式、风格、韵致，以及人的观察、感受、思维的方式，等等。

但衡量文化高、下，优、劣，先进、落后，价值标准应该是统一的，真理的阳光不分彼此。“人”便是衡量高下的“尺”、辨别轻重的“权”。一切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有利的文化就是好的文化；反之就是不好的文化。从启蒙理性的视角来看，文化与教育密切相关。哲学家早就指出，教化有两种：一种是体现着“精神的理性”的，它将人向着“人之为人的普遍性”提升，“在总体上维护人类理性的本质规定”。另一种所谓的“教化”则恰恰相反，其实就是“洗脑”和蒙骗，它不是维护人类理性的本质规定，不是把人向着“人之为人的普遍性”

提升,而是以充满偏见、独断的狭隘经验主义将人向着非理性、个别性下降,尽管这种下降往往是在好听口号的掩盖下进行的^①。马克思所说的以“思想的闪电”把人“解放成为人”,就是把后一种“教化”下的人解放成为前一种教化下的人。区分这两种教育——精神“提升”式的与精神“下滑”式的,对我们十分重要。文化民族主义,不管人们是否已经意识到,它只能把人引导到精神“下滑”式的教育路线上去。

我们应该摒弃文化民族主义,形成开放、大度的文化心态。我们的先人曾经有过这样的心态:“那时我们的祖先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心,同时也对于别系文化抱有极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地唾弃。”这是鲁迅的话^②。我是坚信的。

(2006年10月14日在两岸三地人文社会科学论坛“中国文学与文化的传统及变革”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提纲)

①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② 《孙伏园回忆录·鲁迅先生二三事》。

民族主义文化情结:消解启蒙理性, 阻挠人的现代化

最近十多年来,中国文化界的民族主义文化情结表现得越来越强烈。总的看来,中国现在的民族主义鼓吹者缺乏系统的理论,也并不理性,大多是情绪性的诉求,尚未形成一种自觉的、系统的文化思潮,因此主要表现为一种民族主义“文化情结”的粗陋的讲述。这种民族主义文化情结导致的知识分子内在精神状态的严重恶化、与传统文化的复杂纠缠以及所涉“中西之辩”的误区,需要引起充分的注意。

一、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严重恶化

这种越来越强烈的民族主义文化情结,有一个极为突出的表现,即一些原来持启蒙主义价值观的人突然摇身一变,成了非常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其实,“民族主义”这个概念本来也不完全是反面的。有“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概念,但也有一些民族主义是并不“狭隘的”,而这种民族主义是有其正当性的,比如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其中就有一个民族主义。在当下中国,“民族主义”这个概念运用起来还是比较混乱的,还有大小之分,既有针对国内所讲满族、汉族等“五十六个民族”之“民族”,亦有针对国际意义而言的“中华民族”,而后者显然又有某种“国家”意义,“民族”与“国家”的意义混同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内涵的混乱。在我们当

下的文化语境下,民族主义大多带有负面价值而不太带有正面价值,因此可以不必称其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而直接采用“民族主义”的概念。所谓“民族主义文化情结”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即沉迷于本国的文化,而拒绝外来的、先进的文化。

大约一年前,我在南京见到钱理群教授。因他与摩罗比较熟,我就问了一个问题:“摩罗以前写的文章还是不错的,基本上坚持了启蒙的价值,为什么最近写了一本书,叫《中国站起来》?这不就转向了极端的民族主义立场了,极端到说鲁迅、蔡元培、胡适和陈独秀等这些人都是‘洋奴’,连五四时期的那些极其保守的老先生都没有这么骂过,摩罗的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是内部政治的压力还是经济诱惑?”结果,钱理群的回答令我非常吃惊:“无非是读书多了,进步了!”这个回答令在场的几位专家都非常吃惊。于是我进一步追问:“怎么进步?”钱理群回答:“从个人主义到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当然是进步了!”显然,钱理群在面对民族主义、面对个人主义的时候,也不是很清醒的。最近他在武汉一个关于大学问题的研讨会上有个说法广为流传,即认为我们的大学是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说“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对此,我在五月二十四日的《社会科学报》上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我们当然不要利己主义者,但这样说没有从根本上划清与极左路线和专制主义的界限。我们记得,1949年以来,我们被集体主义教育了好多年,结果发现所谓的集体主义大多是假公济私的借口而已。”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知识分子对自由、民主的要求,对现代化的呼唤遭受挫折,又经过90年代经济大潮的冲击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已经严重恶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知识分子长期被压抑,在80年代刚刚冒出一主体意识,刚萌芽的对启蒙价值、现代性价值的追求,在80年代末被打压下去了。这一严重恶化的主要标志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放弃了“五四”以来的对启蒙价值的守护和启

蒙立场的坚持,导致了整个文化价值体系的解体和混乱。前不久,在一次对话中,我们就对此种文化思想状况提出了一个概括,即知识分子“反价值”、“泛价值”和“无价值”的表现^①。而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老左派、新左派知识分子与权势者的“共谋”,这种共谋用一些反现代、反启蒙的理论,使得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保持一种对体制的“无危险性”甚至同谋性。在这一过程中,本来就存在的民族主义文化情结就在当下情况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膨胀。

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这种恶化,在不少人看来是一种“新的追求”,是一种“进步”。前些天,我与几个已经毕业的博士生谈话时提到我所批评的民族主义,其中一个已是教授的学生跟我坦言,“我现在唯一的依靠就是民族主义”。可见,过去我们都相信共产主义乌托邦,然而现在它对思想的影响力在知识分子中逐渐失效了。此时,知识分子突然发现自身的文化追求失去了根基,而民族主义则正好填补了这一理论根基的空白。在“民族”与“国家”的名义下,为了民族复兴和国家团结,民族主义取得了一定的、客观上的合法性,因此,知识分子在乌托邦失效之后开始信仰民族主义。

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恶化,有以下三种表现。其一,回到传统,回避现实。回到传统、回到古代,如果认真做有价值的学问还好,但有些人却不是如此,而是趋向于“文化帮闲”。“文化帮闲”就是利用文化做一些没有用,对权力腐败也没有任何威胁性的事情,成为一种文化装饰。比如有位颇有成就的古典文学学者,近些年来针对中国人过“洋节”而一直在提倡节日的“中国化”:如主张要将母亲节定在孟子诞生的那一天,这位学者考证应在农历四月二日。且不说学界已经否定了孟子的这个“生日”,再说孟子虽是先秦诸子中比较重民的一个,但其母亲本人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有什么贡献却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这便是典型的“文化帮闲”。另外,民族主义者们

^① 董健、张光芒:《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中的价值观问题》,《东吴学术》2012年第3期。

常常不得不面临一个自身难以解决的思维结构性矛盾：既然是民族主义，排斥西方，那就不要以西方为样板，可是中国没有母亲节而西方有，于是你就以西方为依据要搞一个“自己的”母亲节，这本身就在思维逻辑上违背了自身的价值准则。导致知识分子趋向“文化帮闲”、成为一种“文化装饰”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当下知识分子失去了独立人格，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丧失了对社会的批判精神。

其次，知识分子的“文化帮闲”状态其实还不是最坏的，更严重的状况是知识分子主动成为与权力合谋的“文化鹰犬”。这部分知识分子数量虽然不很多，能量却不小。比如有位研究马列的教授，就曾发表了两篇分量很重的文章，批判普世价值，这对普世价值观的破坏是很厉害的。再者，除了“文化帮闲”“文化鹰犬”之外，更多的是在压制之下做沉默的“文化奴隶”。这样的知识分子数量最多，都是抱着一种“混一混”的心态，不批判、不反抗，只求得在体制下安安稳稳地生存。这些人基本是“中间派”，哪边更得势更有利可图便倒向哪边，也同样丧失了独立的人格。

这么看来，目前的确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状态最坏的时候。反观五四时期，无论是激进主义知识分子还是保守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精神状态都是很正常的。即使是保守知识分子如辜鸿铭者，也都是精神饱满地上课、批判激进知识分子的革命主张，充满了信心也充满了活力。而那些激进者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就更不用说了。还有大批普通的知识分子亦是如此，其主体精神都是极为活跃的。就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知识界充斥的孤独、苦闷也是基于追求的热烈和希望的强烈，否则，孤独与苦闷就不会产生。回到当下，知识分子连苦闷都没有了，留下的唯有麻木。这其实就是鲁迅讲的那种失去了能想的头还活着的状态。再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思想改造，尤其是“反右”，算是知识分子的一次大灾难，他们都很痛苦，这痛苦来自对正当自我的否定和抛弃，然而，就是这种痛苦，现在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当下，知识分子除了成为“文化帮闲”“文化鹰犬”，就是默默地成为“文化奴隶”，对社会历史除了麻木还是麻木。

除了政治、经济原因,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教育屡次遭到破坏,也是导致知识分子精神状态恶化的直接原因。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提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教育遭到了五次大破坏。第一次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思想改造和大学院系调整,这是对五四时期以来的现代知识分子一次致命的打击;第二次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这一次将前一次打击之后知识分子残存的一点元气也给打掉了,对知识分子独立思考能力的打击则更为系统,更为致命;第三次是“文革”,这次便是彻底地打击了知识分子的精神,使得知识分子彻底丧失了精神力量,连学校和正当的各种教育制度都被打倒和取消了;第四次是八十年代末,直到1992年才稍有缓解;第五次就是九十年代以来的商品经济大潮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打击,这次前所未见的、其表面看来似乎并不来自政治专制主义的打击,导致知识分子逐渐回避精神观照,退隐自我庸俗生活。这五次打击,使得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不断地恶化,丧失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逐渐“奴才化”,及至当下,尤为严重。

二、传统文化的沉重负担

民族主义的文化情结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在于它包含着一种强烈的“寻根”意识,民族主义鼓吹者们总是在不断地去传统中寻找文化的“根”。民族主义者的“寻根”,是要从传统中寻找对现实问题的回答,面临现代历史带来的现实问题的时候,他们表现得极其不安,希望能在传统文化里找到某种安慰和满足,这是民族主义文化情结的一贯表现。

总的来说,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有精华亦有糟粕,并不是文化越古老、越悠久就越好。民族文化历史的长和短与这个民族在当前处境之关系,是双面的而不是单面的,说文化越悠久越好不过是对传统文化认识的一个误区而已。其实历史已经证明,文化传统越悠久的民族,反而其精神负担更重,其现实进步就更